

《道德经》新论

——道即价值体系论

岳德常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道德经》新论

——道即价值体系论

岳德常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 郑州 •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依据这个新成果，本书提出了一个新论点：老子所说的“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围绕这个新论点，本书对《道德经》进行了新的诠释，从而把最古老的老子学说与最现代的政治科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新论：道即价值体系论 / 岳德常著.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80734 - 668 - 5

I. 道… II. 岳… III. ①道家 ②老子—研究 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B223.15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3697号

出版社：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黄委会综合楼14层 邮编：450003

发行单位：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371-66026940、66020550、66028024、66022620(传真)

E-mail: hhsclbs@126.com

承印单位：河南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22.5

字数：404千字

印数：1-1 500

版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前言：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对话

——老子所说的“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中央于 2006 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执政近六十年来不懈奋斗、艰苦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成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建设这个价值体系，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现实问题。

除了对价值体系问题怀有兴趣以外，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道德经》的精深博大怀有一种敬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很想知道老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看了很多注释，仍然没有找到满意的解答。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后，忘记了是哪一天，我突然有了一个领悟：老子所说的“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西方人不是喜欢搞一些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东西么？我觉得我这个领悟也可算是一个猜想，但比哥德巴赫猜想要更加重要：首先，它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它解答了“道”是什么的问题，“道”也无非就是由人们的各种需要组成的价值体系，这就把以往注释家们描绘得玄妙无比的“道”具体化了，使它成为普通人也能理解的东西。其次，它把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放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之中，它承袭了中华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这样一来，也就解决了某些专家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问题，从而使我们恢复原有的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地站在历史的前列。再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这便是老子所指出的那个路径，从“修之于身”做起，然后是“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邦”，直至把这种价值体系“修之于天下”。通过这个猜测，我们便可以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上观察现实问题，把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为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找到答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仅仅提出这个猜想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证明这个猜想。要想证明老子

所说的“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把《道德经》从头到尾检视一遍，看看其中有哪些符合这个新命题，哪些不符合，不符合的原因是什么，找出合理解释，于是就需要对《道德经》重新进行一次诠释。随着人类实践和思想认识的进步，古代的典籍总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认识，这也是正常的。然而，对缺少专业经验的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但既然自己提出了这个猜想，那就必须鼓起勇气，先试试再说。

在重新诠释《道德经》之前，我首先要对老子的“道”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联系谈点看法。

所谓价值体系，也就是由人的各种需要组成的体系。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便是人的需要的成长过程。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他的需要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①小朋友不具有成年人的需要，但那些需要仍然潜在地蕴含在其身体内，这就像一粒树种潜在地包含着长成一棵大树的可能性一样；同样道理，尽管原始人不具有现代人所具有的需要，但这些需要也已经潜在地蕴含在人的遗传密码之中了，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这个遗传密码的展开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漫长的精神进化之旅。与动物和植物的成长过程不同，人类需要的成长过程还伴随着一个自我认识过程；它本来就蕴含在人的本质之中，但人能否把它发展出来，则要取决于人对它的认识理解程度。如果人们有足够的力量认识到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老子称之为“常道”），便可以自觉主动地创造条件去实现它，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保持和谐，圆满地走过生命的各个阶段。但如果人们没有力量认识“常道”，所接受的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会盘踞人们的头脑，把人的发展引入歧途，违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识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着错误和罪恶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敬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但‘腐败了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蛮’。”^②由于存在着变得更野蛮的危险性，所以人就有必要研究“常道”，以引导

^①[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202页。

^②同上，第203页。

自己正常健康地发展。就像迷宫里的老鼠急于找到出口一样，人必须找到“常道”，找到真正的“自我”，这是自然为人类所设定的先验的目标。那个“常道”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但我们并不能在一开始就发现它，所以就要有一个漫长的觉悟过程。哲学也就是一连串的开悟的过程，一个为达到那个先验目标而不断觉醒的过程。于是我们终于发现，哲学的目标就是引导人们认识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们闻道，宗教也为这一目标发挥了作用，所以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闻道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这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迟早都要接触到这个题目。老子率先深入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正是其五千言魅力永存的原因之所在。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还认为，精神的自我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逻辑必然性。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还写了一本《哲学史讲演录》，他发现了时代精神进化的内在逻辑，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发现。但是他也有局限性，那就是把他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视为精神进化的终点，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回过头来看，他所说的精神的自我运动，也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进步过程。为了理清社会价值体系进化的内在逻辑，我们必须使用哲学范式^①的概念，精神的自我运动，价值体系的进化，即是哲学上的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换，这个哲学范式的转换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而这个逻辑必然性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人性展开的逻辑，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但必须强调的是，要认识那个“常道”或者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不是单个人所能单独地完成的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的成长过程。所以，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②换作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就像一粒种子要经历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它经历了一系列的环节，也就是人类

^①范式的概念和理论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进行了系统阐述。它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构成了科学家们的共同信念，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家集团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72页。

历史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必须有一个价值处于这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围绕这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比如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史，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演变史，或者说是生产力的发展史，或者说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史等，但要从最直接最本质的角度来看，还是要考察价值体系的成长史。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无非就是人的需要的展开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思想意识的不断的觉醒过程，原来处于潜意识之中的需要，上升到人们的意识层面，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核心价值。这个成长过程的最集中地体现在哲学史里面，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哲学史，便可以把它概括为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用库恩的话来说便是四个哲学范式。

(1) 第一级范式即寻找世界本原的范式，简称为本原论范式。

这个范式对应于人类的科学兴趣、求真的需要、爱智慧的需要，这是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即使是进入了下几级哲学范式，它依然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一。

这一范式产生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之前，“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都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1]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人们，多少有了一点自由，他们把兴趣投向外部世界，他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急于弄明白这个世界的来历，想找到本质性的东西。如泰利士就认为水为万物的根本，后来的赫拉克利特认为宇宙是“一团永远活生生的火”。这种寻找肯定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因为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这种寻找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上帝，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神话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最初的答案，上帝创造了世界，他先创造了水、火、土、气四元素，这些元素混合形成了万物。由于上帝的加入，开辟了人类精神的新的发展方向，哲学于是便过渡到下一级范式。

(2) 第二级范式即上帝与灵魂的范式，简称为上帝论范式。

这个范式产生于人类追求肉体解脱、心灵安宁的需要。这种范式实际上是本原论范式的延伸，由对物质世界的本体的探索进入到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探索，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人类自身。生活在持续动乱而又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代，人的躯体成了他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于是转向宗教寻求生命的意义。人们无不渴望幸福，但它们在现世中无法实现，只好寄望于来生或者是天国。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5页。

借助于上帝、佛主、真主等的力量，人们把自己从所沉溺于其中的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中解救出来。这个范式以灵魂的解脱为核心价值。

对道德秩序的需要，对理想正义的需要，这也是人类的永恒需要。如果没有向上的引力来引导人性，如果不能驯服人的与生俱来的野性，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便会堕落到动物式的存在水平上，在内耗中自我毁灭。这种需要萌发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在地球的几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9〕}人类的智慧与其生存本能相结合而产生了私有制，反过来又制造了矛盾对立与灾难，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这就迫使那些特别敏感的人们把追寻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来，关注自身的命运。他们发现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威胁着人的生存，为了控制命运，于是人们便从灵魂与上帝的探索中来找答案。人类的注意力被引向那个神秘的所在，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上帝，追求的目标是在死后进入天国，以此来把人类从野蛮状态中提升出来；对于普通大众，宗教家们则杜撰出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来进行恫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欧洲人误入了歧途，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自我摧残。为什么对上帝和善的追求反而导致了不幸？这是因为人类的解放必须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的进步，某一个领域里的单兵突进，必然会导致社会有机体的不协调，更何况那种以上帝的名义颁布下来的道德是低水平的禁锢人类健全成长的道德。所以，它就必然地受到人的健全天性的抵制，上帝的存在受到了怀疑，于是那些维护上帝权威的教会便要努力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产生了一种经院哲学，这种哲学训练了人们的思辨能力，从而开拓出人类精神的新的发展方向，为人类进入下一个哲学范式奠定了基础。

（3）第三级范式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范式，简称为思存论范式。

笛卡尔开启了 this 哲学范式的起点。他关注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过程，对知觉的结果持怀疑的态度，对每个看似不易真理的东西，笛卡尔都坚持要通过思考来重新验证。他要找到那种不证自明的第一判断，即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然后再根据理性，一点一点地重新建立起自认为可靠的体系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大前提都是“自明”的，并没有做深入的考量就用来作为逻辑起点，但是后来科学的发展证明很多大前提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误判而已，尤其是伽利略的科学和培根的新工具指出了亚氏的大前提的很多缺漏。笛卡尔就是要重新确立大前提的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8页。

有效来源，这就是通过人的思考，通过理性对各种材料进行考量，得到新的结论，找到逻辑的新起点，找到那种“自明的第一判断”。他最后找到的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样他就把哲学的兴趣从外部世界转向主体的认识过程，在这种哲学范式中，哲学研究沉溺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思辨中，没有深入到社会价值体系问题，更没人明确地主张要建立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但实际效果却是放纵了这种价值体系的发展。

笛卡尔的这个思考很了不起，开启了哲学思考的新方向。但现在看来，他的怀疑仍然不够彻底，还有很重要的也决定着人类认识过程的东西没有被他注意到。我们发现，人的认识过程只是人类整个实践过程的一个局部领域，在认识领域里所找到的“自明的第一判断”，并没有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反而把人们引向物质与思维对立的哲学范式。因此，笛卡尔的怀疑是不彻底的。哲学因而就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要把笛卡尔的怀疑进一步扩展开来，扩展到包括认识过程在内的整个实践过程，在这整个实践过程中也要找到“自明的第一判断”，保证人们能够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那个“我”是一个抽象的点，而在实际上，作为出发点的“我”却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①，人从远古走来，带着那种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与动物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因而是不能自明的。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研究没有使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问题，但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天上转移到尘世，把那种不能自明的价值体系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世俗生活的需要置于核心价值的位置，所以与这个哲学范式相伴的还出现了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所谓的“唯物主义”给人们放纵情欲物欲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是人的不言而喻的本能、天性，但对其过度的放纵反过来又危害了人的生存。在经历了漫长的苍白的中世纪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关注现世的幸福，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与这个范式相对应的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客观世界的实践。与之相应的，人们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类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但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反过来成了自己也无法驾驭的妖怪。

为了限制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时所随身带来的非理性的情欲物欲，宗教曾经进行了艰难的努力，但却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导致了中世纪的各种悲剧；总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教训之后，人们于是就干脆放弃这种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有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尼采大声疾呼“上帝死了”，那是因为有一个“货币拜物教”取代了上帝。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要超越动物式的非理性的情欲物欲，要想超越丛林法则，就必须让它充分发展，把它的弊端充分展示出来。当哲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之后，现实生活就按照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去了，抽象的自由民主与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价值体系结合在一起，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灾难。在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实践中，人们找不到生命意义的终极解答，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就像古罗马的武士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一样，现代人在市场法则所营造的环境中也必须厮杀到人生终点。要想改变这种命运，人们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新的竞争规则，也就是说，必须建立新的价值体系。这不是说他个人建立新价值体系就可以了，而是要在社会集体中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个体在精神上觉悟过来，关注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这就是下一级范式所关注的问题，这才是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范式是向下一个范式转化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中介环节。那个原有的世界是与人相异化的世界，人类要想把它转化为一个“人化”的世界，就要把它分解之后再重新组装，就像是一件陶器，必须把它摔碎、研磨成粉末，然后再用水调和起来，重新塑造。人类在这个重塑世界的过程中所用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我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绞出的“脑汁”、改造世界过程中流出的血与汗。只有让我们的“脑汁”、血与汗渗透到世界中去，人类才可以重建一个自己熟悉而又可以驾驭的世界。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苦难的历程，必须经历一个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范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模式。

（4）第四级范式即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范式，简称为知行范式。

这是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它对应于人类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对应于人类把这些需要协调统一起来的需要。在文艺复兴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世俗事务上来以后，后来的人们在这个方向上又走得过了头，人类精力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以至于必须花费巨大的气力才能把它重新高举于尘世之上。这个努力以马克思为起点，他发现了“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对这个“我”的深入发掘，又开辟了人类精神成长的新维度，展示了人性进化的新领域、新尺度。马克思还发现了这个尺度对人的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他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①并进一步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涉及到实践的同时，也就必然地要涉及到人的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进而推动人们研究人的需要、目标，研究人的价值体系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关系的哲学范式，它产生于我们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资本主义的颠倒混乱迫使人们思考为什么追求着个人利益的人们却不能实现目标，从而引导人们关注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为了社会的科学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人类不能再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制地掠夺自然和剥夺别人，而是要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所以就要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把人们组织起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探索。这就是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其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要把实践的结果作为“自明的第一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进步也不是哲学的终结。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有那么一些人，即使是实践的结果一百次一千次地告诉他，他的实践是错误的，但他仍然执迷不悟，仍然要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思考问题的第一判断并不是“我思故我在”，它称不上是第一判断。在这个思考着的大脑下面，存在着的是一个活着的个体，而这个个体又是生活在社会历史过程之中的，决定着其思想和行动的是他的需要、他的利益，以及他对自己的利益的认识，也就是他的价值体系。由于人类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中发展进步着的东西，那种完善的价值体系还在诞生过程之中，于是我们人类就生活在发展中的价值体系的支配之下。这种价值体系是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必然存在着自相矛盾，在它的控制下，人类的行为便自相矛盾。比如说美国人制造出经济危机，然后又拆东墙补西墙地想办法救治，而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又进一步推波助澜，所以便很可笑。如果不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5页。

^②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928页。

变作为其思考问题的第一判断的那个价值体系，如果不能进化出一个不再自相矛盾的价值体系，他们就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所以，人类必须关注自己的价值体系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价值体系上找到那种“自明的第一判断”，发展出那种最完善的、内部和谐同时也能普及开来的价值体系。只有达到了这一点，人类才能最终进入和谐社会。

站在实践与价值体系之关系的这个新范式上来看，第三级范式所提出的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纯粹是一个从思辨的兴趣出发而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无助于人们解决当下所遇到的生存发展问题。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我们的头脑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找到这个新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从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无论是物质还是意识都极其重要，现在再来追问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要关注的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诸如为什么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愈演愈烈，为什么两极分化和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自毁家园，人类还能否拯救；我们怎样掌握社会管理的主动权，提高执政能力，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问题引导人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问题。前面说到人类要用自己的“脑汁”、血与汗来重建世界，但这还不够，人类必须发展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的价值体系，以其为序参量来重建社会运行过程，才能最终解开历史之谜。

由此可见，这个由第三级范式向第四级范式的过渡，并不是由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的，而是要由马克思这一类新型知识分子来引领，并且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才能深入到社会运行的深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3页。

抓住根本。在这个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共产党人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不断地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在每个新问题面前，都要经历一个“遭遇挫折——总结教训——解决问题”的轮回，然后再迎接下一个新问题。改造旧世界的革命就在这样的不断试误的过程中步步深入，直到接触到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只有通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政治过程，才能把诸多关于理想社会的抽象原则整合起来，在头脑里形成一个具体完善的理想社会目标，从而指导人们正确行动，在现实中把理想社会建设起来。

引导和推动人类进入第四级范式，这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我们也注意到，在从第三级范式向第四级范式过渡的过程中，还有一派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他们也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的生存体验，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对人性的损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号召人在自由选择的行动中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存在，承担自由的重负，对自己的行动、对整个世界负责。……号召人摆脱既定的一切，依靠与己俱生的自由去创造自身的未来，人只有依靠自己才可自救。”^{〔1〕}但他们只是发现问题，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便陷入郁闷、绝望中。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实现“民主、自由、人权”作为解决现实困境的最终答案，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模式，可在实际上，西方人搞了几百年，社会依然不和谐，人生依然不幸福，面临重重危机而看不到出路。坚持这个目标，就像苍蝇为了从房间里飞出去而撞向玻璃窗一样，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是没有出路的。比起存在主义来说，他们缺少对人生命运的深刻关怀，所以其“民主、自由、人权”必然地流于虚伪、空谈，在实践中则导致灾难。我们批判“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虚伪与谬误，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民主、自由、人权”，而是提出更深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在这里面，凡是初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括着，”^{〔2〕}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民主、自由、人权”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实现。

这四个范式依次展开的逻辑过程，也就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对世界本原的追求引导人类从愚昧中走出，对美德的追求引导人类从动物式本能中走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引导人类从贫困中走出，对人格完美的追求引导人类从内耗走向

^{〔1〕}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45页。

和谐，它们都是人类精神进步的必然环节。人的各个级别的需要都必须作为核心价值来追求，都必须达到极端的程度，才能充分展开，从而为更高级需要的产生铺平道路，由新出现的更高级需要出来矫正其过度发展的弊端；· 矫枉必须过正，人类在这个方向上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积淀到文化中去。新达到的哲学范式并不否定原来的范式，而是把它吸收进来，以更高级需要为核心重新建立起完善的价值体系。四个范式犹如植物成长必须经过萌芽、成长、开花等成长阶段一样，其目标是达到第四个范式，把人们从动物式的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有很多人始终停止在动物式的生存状态，有一部分人则在不断地开拓人类的精神世界，前三个范式也一直在创造着新的境界，但却没有达到目标，必须达到第四个阶段，进入实践与价值体系的哲学范式之后，人类精神才算最终修成正果，从幼稚中走出，找到了历史之谜的解答。

这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是历史的主旋律。实际上，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这四个范式都是同时并存的，只不过是其中只有一个范式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的处于附属地位。那些处于附属地位的范式，即使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也仍然存在着，在人们无意识状态下发挥着作用。比如人类改造自然的需要，这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发展是硬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停止的；对科学的兴趣，对道德的追求，也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停止的。所以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还有人关心灵魂，信仰宗教。即使是在人们普遍地遵行着丛林法则的西方社会，也还有人追求着利他主义的目标。此外，追溯起来，主客两分的思维范式实际上始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笛卡尔不过是“完成了或者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9〕}

当人们对某种核心价值的追逐走上极端，难以为继，以至于威胁到人类基本生存时，新的哲学范式就该出场了。于是便会有新的核心价值出来取代原来的核心价值，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四个范式是人的需要的四个维度，它们都开辟了新方向，或者说是新领域、新境界，都引导人性向上，就像火车头拖着车厢前进一样。与这些引导人性精神向上的倾向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中天然地存在着那种趋向于堕落的力量，它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为了找到人类的各种灾难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进行治疗，无数杰出人物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这便是哲学范式进步的内在动力，这就像为火车更换一个马力更强大的火车头一样。这个探索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科学兴趣开始，步步深入。就像在迷宫里的老鼠一样，人类沿着一

^{〔9〕}这一句是罗素的话，转引自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见于2006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

一条狭窄的通道往前奔跑，他们总是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问题，总是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选择，永远有危机伴随着他们，驱使着他们永不停息地向前狂奔，就这样一直跑到尽头，直到无路可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有一扇小门，于是便钻了进去，原来这里面又是一片新天地；于是人类便开始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又会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人类又需要找到新的小门，发现新的天地。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到发现第四个范式，开辟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境界，人类才最终走出迷宫，找到历史之谜的最终解答。

我们还可以用雕刻家创作一尊雕像的过程来作比喻，那最后形成的完善的价值体系就如同那最终完成的雕像，它本来就存在于大理石毛坯里面，但需要经历漫长的雕刻过程，才能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对于以前各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所拥有的雕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那些高级需要没有被他们所认识，但这些需要仍然存在着，他们必须在生活过程中继续雕琢它，让它逐步呈现出来。人类就是自己的雕刻师。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①先知们所提出的各种救世方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准病源：人的生存需要在私有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基督教就没有把这两者分析开，所以就认为人生下来就带着“原罪”，他们不能设想一种新的满足生存需要的方式，于是便认为，人们要获得解脱就只有在死后进入天国。有那么一些儒家信徒也没把这两者分析开来，他们把“人欲”视为与“天理”相对立的有害东西，佛教则为之设定诸多戒律，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然他们都怀有良好愿望，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直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苦难的根源之所在，才最终找到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并不是反对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消灭私有制”，对这种需要在私有制社会的表达方式动一个手术，打碎外部形式，拯救其内涵，让人的基本需要获得正常表达，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个性和谐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因而前三个范式都没能正确地提出问题，一直在绕圈子，做清扫外围的工作，到了马克思才接触到实质问题。我们现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讨论则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理论，结束了关于人的本性的空泛议论，扬弃了“人的本性”与“人的本质”这两者的区别，把这个空泛的理论问题转化为一个现实政治的具体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7页。

问题的新提法本身就已包含着问题的解决。前三个范式都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它们都只是突出了人类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与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相脱离，甚至是相矛盾，哲学范式的步步深入，必将引导人类由片面而进入全面，进入第四级范式，最终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智慧。现在看来，历史的终极目标便是在社会生活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哲学上进入第四级范式。在知行范式的哲学基础上，人类才能进一步对价值体系的优劣进行鉴别，从而摆脱丛林法则的束缚，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人们便会合乎逻辑地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异化现象和剥削压迫制度；在追求这种核心价值过程中，人类才能摆脱异化现象，从内耗丛生、战乱贫困的纠缠下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有了这个关于哲学范式进步过程的整体认识之后，我们便可对东西方的哲学进展过程作一个对比了。我们中国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很超前、很早熟，很早就进入了第四个范式，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所一向孜孜以求的“闻道”，我们中国人从老子开始就认识到的问题，西方人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想到，其间依次经历了本原论、上帝论、思存论等三个范式，直到出现了马克思，才进入第四个范式：知行论，研究人的价值体系与实践的关系。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所以当代西方社会至今也没有达到老子的高度，他们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甚至想不到要摆脱其纠缠，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价值体系这个层次。

在达到了这个思想高度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便可发现，它们并没有抓住根本问题。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也不过就是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人们不知道自己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但生活却一刻不停地继续着，其行为的不合理性也就在继续着、积累着，于是便出现了“异化”，甚至要把人类推向毁灭的境地。现在看来，哲学上所谓的“本体论”问题所要寻找的归根到底就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那个东西，这就是价值体系问题，它就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序参量；所谓的“认识论”也就是要研究人类如何才能认识自身的价值体系问题；而要想认识自身的价值体系，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自身的价值体系必须有一个充分的发展，才能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反思现实中控制着社会运行的价值体系，发现其中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付诸实践，改变世界，这就进入“知行论”范式了。

于是我们便可明白了，哲学上的所谓“中西之辨”，其实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哲

学范式的区别。有些人用西方的那一套思存论范式来套已经进步到知行论范式的中国哲学，于是便产生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还有人就老子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争论不休，这就像用一件小孩衣服往大人身上套一样，当然是不伦不类的了。尽管有很多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没有得到其精髓，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中，实际上还处于第三级范式上。而马克思则超越了第三级范式，与中国哲学处在同一级范式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只能生存在书斋里，而在中国却可以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生根开花，大行其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反过来也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并进一步追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还一再地强调世界观问题，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以他的探索为基础，我们现在进一步发现了人的实践过程中的价值体系问题，因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化，进入研究价值体系的实践和认识的新哲学范式。这个由马克思开创的过程，最终由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完成，看来是众望所归，舍我其谁。

由此可见，我们中国哲学本来就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哲学”，这种自我贬低、甘愿寄人篱下的念头是非常荒诞的。尽管我们中国的哲学还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还有待于进一步与时俱进，那些杰出的智慧还有待于普及开来，但要比西方哲学高一个档次。我们所提出的目标是“闻道勤行”，所探讨的问题是究竟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我们研究的是生存的智慧问题，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合理性问题，我们也思考但却并不纠缠于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而西方哲学则一直纠缠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也发现了这种哲学范式的缺陷，他对“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你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